



CJEAS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第1卷第1号 2017年8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日本对外政策之中的亚洲区域主义
——从自民党政权到民主党政权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I
■ 论文	
前言.....	1
战後日本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	3
安保再定义与日本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	6
民主党政权的东亚共同体主张与政策.....	10
结论.....	16
■ 附记.....	
	i
■ 作者简历.....	
	ii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战後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与民主党在执政期间推动有关亚洲区域主义的相关对外政策时，其理念与实践有何异同。日本民主党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而达成政党轮替，由於过去民主党批判自公政权的对外政策重美轻亚，导致其提倡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被质疑为反美。不过自民党政权早已推动了亚洲区域主义的相关政策，过去的研究也指出，日本至少在追求亚洲区域主义与美日同盟的互补或平衡。那麼应如何观察民主党的政策？其与自民党政权时期有何异同？本文检讨了战后日本对外政策之中的亚洲区域主义後发现：自民党执政期间以美日关系为考量推动相关政策，并为了稳定日中关系，希望将中国引导入亚洲区域主义，只有小泉首相在日中关系的态度较为例外；无论是鸠山首相主张的东亚共同体，或是日本对外政策基础的美日关系、同为重要关键的日中关系，民主党执政期间所推动的政策不但没有达成具体的成果，从过程中反而可以看出民主党对相关政策并没有系统性的规画与思考，导致了鸠山政权期间美日之间失去互信，甚至连日中关系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生了影响至今的对立；菅、野田政权最後重返了过去自民党以对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代表日本任何政党执政，都难以改变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架构。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gap between the rhetoric and practice of Asian regionalism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administrations. Its finding i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is in power, it is difficult for Japan to move away from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the cor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Early on, the LDP developed Asian region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sought also to absorb China into this regional framework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Japan-China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rhetoric changed under the DPJ administration. Although the party declared an intention to promote Asian regionalism prior to its electoral victory in summer 2009, its subsequent policy was incoherent and did not envision a clear role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fact, soon enoug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anaged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Japan and its staunch postwar ally. Japan's relation with China also deteriorated under the DPJ administration due to the Senkaku Islands dispute, forcing eventually the DPJ to returning to postwar Japan's principle regional policy centered completely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日本对外政策之中的亚洲区域主义： 从自民党政权到民主党政权

黄伟修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 前言

日本第 45 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以下依照举行的时间简称为 2009 大选）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举行，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 308 席的过半数席次，击败了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为自民党）、公明党的联合政权而达成政党轮替，民主党代表（党魁）鸠山由纪夫当选首相，并与社会民主党、国民新党组成联合政权¹。由于这是 1955 年以来首次由非自民党的政党在众议院单独过半，所以民主党政权的政策走向受到各方注目²。

其中民主党最受国际间瞩目的对外政策主张就是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由于民主党于在野期间批评自民党政权的对外政策是重美轻亚³，因此民主党虽然在政党轮替前不断强调美日同盟与亚洲外交并重，但其「东亚共同体」构想仍被日本媒体解读为是为了对抗自公政权以美日同盟为主轴的政策⁴。而美国对亚洲的区域合作虽然是态度摇摆不定，但对民主党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则是有所疑虑⁵。

¹ 本文将 1955 年到 2009 年 9 月 15 日期间由自民党单独执政，或自民党与公明党、自由党、保守党等小党组成的联合政权简称为自民党政权，2009 年 9 月 16 日至 2010 年 6 月 8 日的鸠山由纪夫内阁简称鸠山政权，2010 年 6 月 8 日至今的菅直人内阁简称菅政权，2009 年 9 月 16 日之后的时期则简称民主党政权。

² 1993 年 8 月到 1994 年 6 月之间曾有细川护熙、羽田孜两个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不过自民党在 1993 年 7 月的第 40 届众议院大选中虽未过半，但在 511 的席次中保有 223 席，仍是众议院第一大党。相关数据可参阅石川真澄，《戦後政治史》（東京：岩波書店，新版，2004 年），第 234 頁。

³ 例如小沢一郎、菅直人，《政権交代のシナリオ：「新しい日本」をつくるために》（東京：PHP 研究所，2003 年），頁 53-72。〈民主、政権交代をアピール：岡田代表「アジア重視」、小泉政権と差別化〉，《日本経済新聞》，2004 年 12 月 19 日。〈民主党「小沢色」外交で発信〉，《朝日新聞》，2009 年 2 月 25 日。

⁴ 〈民主外交、板挟み 米に配慮、社民反発 総選挙で政権交代視野に〉，《朝日新聞》，2009 年 7 月 24 日，2 総合。小川聡、宮井寿光，〈日米 マニフェスト点検、米 警戒まじり注目〉，《読売新聞》，2009 年 8 月 6 日。〈マニフェスト最終点検、成長・財源どう両立：外交・安保、自民、日米同盟を強化〉，《日本経済新聞》，2009 年 8 月 30 日。

⁵ 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态度可参阅 Richard J. Samuels and Christopher P. Twomey, “The Eagle Eyes the Pacific: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ptions in 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不过，过去最常被民主党批评为重美轻亚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却是第一位表态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日本首相⁶。小泉首相任内也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涵盖范围比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更为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⁷。而日本在 2007 年与泰国、印度尼西亚，2008 年与东南亚国协（Association of South -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签署的 EPA 也是小泉政权时期开始进行的政策⁷。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东亚共同体在内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并不一定带有反美的意涵，以重美轻亚来概括小泉政权、自公政权甚至自民党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也太过单纯。

同时，美日关系无疑是日本的对外政策的核心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也有学者指出，过去自民党执政期间至少寻求亚洲区域主义或联合国中心主义等多边合作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平衡或互补⁸；也有学者批评日本坚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政策而不重视亚洲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但同时也肯定日本在亚洲的多边经济合作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⁹。

那么日本过去是如何推动亚洲区域主义的相关政策？民主党的主张与自民党政权时期有何异同？再者，鸠山首相辞职后，继任的首相菅直人、前外务大臣的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相当于我国的党秘书长）等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都曾提出类似的主张¹⁰。菅首相也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于国会的所信演说（相当于我国行政

in Michael J. Green,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 -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3-20.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in East Asia: Power, Markets, and Grand Strategy", in 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 -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7-54. 伊藤剛, 「日米同盟の「主体」と「客体」」, 武田康裕、丸山知雄、巖善平編著, 《現代アジア研究 3: 政策》(東京: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 年), 第 51-70 頁。大矢根聡, 「アメリカの多国間主義をめぐるサイクル」, 大矢根聡編, 《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 多国間主義の地平》(東京: 有信堂、2009 年), 第 228-254 頁。美国对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主张的疑虑可参阅以下报导: 「米抜きアジア連携に警戒 トン・米高官、APEC 主導強調」, 《朝日新聞》, 2009 年 10 月 16 日。「米紙 目立つ鳩山政権批判」, 《読売新聞》, 2009 年 10 月 28 日。「鳩山対米外交、軸足はどこに、盧・韓国前政権と類似点?」, 《日本経済新聞》, 2009 年 11 月 8 日

⁶ 首相官邸, 「小泉総理大臣の ASEAN 諸国訪問における政策演説」, 《首相官邸》, 2002 年 1 月 14 日,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2/01/14speech.html>>。

⁷ 外務省, 「日・ASEAN 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treaty169_15.html>; 経済産業省, 「我が国の EPA/FTA」, 《経済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08/2008honbun/html/i4320000.html>>。本文引用的所有网址皆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确认。

⁸ 例如西原正, 「アジア太平洋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の枠組みと日本」, 《国際問題》, 第 480 号, 2000 年 3 月, 頁 38-52。田中明彦, 《新しい中世: 相互依存深まる世界システム 文庫版》(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社, 2003 年), 頁 277-309。伊藤剛, 「同盟の「拡大」と「多元化」: 東アジアの潜在的脅威への対処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 《国際政治》, 第 135 号, 2004 年 3 月, 第 11-23 頁。

⁹ 天児慧, 《中国・アジア・日本: 大国化する「巨龍」は脅威か》(東京: 筑摩書房, 2006 年), 第 157-163 頁。

¹⁰ 民主党, 《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3》(東京: 民主党, 2003 年), 第 37 頁。民主党, 《Manifesto

院长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表明,将推动参与「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谈判,以建构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来促成东亚共同体的成立¹¹。显示民主党执政期间,东亚共同体可能还是主要的对外政策议题,那么菅首相以及之后的野田佳彦首相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上,与鸠山政权期间有什么不同?

此外,虽然民主党已经下台,但为了理解日本对外政策之中有关亚洲区域主义政策的发展,有必要对此研究问题加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验证民主党执政期间有关东亚共同体主张与政策,以探讨日本的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以及自民党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政策异同。

本文首先分析战后到冷战期间,其次此外,美日同盟虽然是日本对外政策之中最重要双边关系、核心,但由于本文的分析焦点是日本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因此在进行分析时不一定直接论及同一时期的美日关系。

二、 战后日本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

(一) 战后到冷战期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战败国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对外政策除了对美关系以外,就是设定其在亚洲的角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外务省调查局邀请了经济界与学界人士、官僚组成了「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为特别委)」进行研究。由于蜡山政道、平贞藏、大来佐武郎、杉原荒太等主要成员都曾经参与二次大战期间影响了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昭和研究会」的相关活动,因此其焦点仍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区域主义¹²。但特别委也记取了日本当年为了从东亚排除欧美各国的势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教训,由大来等人负责执笔的报告书即指出:「今后日本经济有逐渐依赖美国的趋势,但是应该避免完全依赖美国经济,因此需要维持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而美国也不可能切断与东亚的经济合作,最终应该会走向与东亚经济相结合的方向;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日本不需要再考虑军事层面的状况下,过去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基础所推动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政策已经没有意义,今后日本的工业发展方向不应该排除美国,而是与美国合

マニフェスト 2004》(東京:民主党,2004年),第18頁。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5》(東京:民主党,2005年),第22頁。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7》(東京:民主党,2007年),第28頁。

¹¹ 首相官邸,〈第176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10/01syosin.html>>。

¹² 中村隆英、大森とく子編,《日本経済再建の基本問題:資料・戦後日本の経済政策構想第一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頁51。大东亚共荣圈与昭和研究会可参阅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作并以互补的方式与东亚地区相结合，以朝向对美国、日本、东亚各国都有利的方向前进」¹³。渡边昭夫等学者就认为，日本在战后即是基于特别委提出的「开放式区域主义」的思想推动了亚洲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¹⁴。

此外，当时美国的冷战战略除了政治与军事手段以外，也透过经济援助协助非共产国家经济复兴，防止其遭到共产主义渗透。而日本透过推动「开放式区域主义」不仅可以与当时被视为是亚洲经济复兴的核心地区：东南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关系，也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¹⁵。

當時日本推動的一連串政策主要有：鳩山一郎政權的「亞洲決算同盟（アジア決済同盟）」、「地區開發基金（地域開発基金）」，岸信介政權的「東南亞開發基金構想（東南アジア開発基金構想）」，池田勇人政權的「日太平洋友好帶的構想」，佐藤榮作政權促成的「東南亞開發閣員會議（東南アジア開発閣僚會議）」。可是这些日本为了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所提出的政策不是无疾而终，就是达成的成果有限。例如日本在万隆会议之中完全沦为配角，东南亚开发基金的构想不被东南亚各国接受，1966年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东南亚开发阁员会议在1974年后无疾而终。只有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设立能称得上是成功，但是日本争取将 ADB 总部设于东京的计划则失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东南亚各国内部不仅存在着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因为二次大战的经验而不希望由日本主导区域经济合作。所以当时的成果仅限于日本基于战争赔偿而建立的双边经济援助关系¹⁶。

不过基于「开放式区域主义」所推动的政策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强化了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更促成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成立。美日从1980年代开始就因为农产品、汽车、半导体等贸易问题出现摩擦，加上欧洲统合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也开始加速，通商产业省（以下简称为通产省）担忧日本会被排除于美国与欧洲市场，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基于「开放式区域主义」与美国推动横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大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美国最初虽然抱持着怀疑的态度，ASEAN 各国也对美国的参与保持警戒，但是美国、澳洲、ASEAN

¹³ 中村隆英、大森とく子編，前掲書，第200頁。

¹⁴ 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出発点〉，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東京：有斐閣，1985年），第11-28頁。井上寿一，〈戦後日本のアジア外交の形成〉，《年報政治学》，1998年号，1999年，第129-147頁。波多野澄雄，〈戦後アジア外交の理念形成：「地域主義」と「東西のかけ橋」〉，《国際問題》，第546号，2005年9月，第54-57頁。

¹⁵ 天児慧，《日本の国際主義：20世紀史への問い》（東京：国際書院，1995年），第89-92頁。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1950～2005》（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1-6頁。

¹⁶ 井上，前掲論文。大庭三枝，《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境界国家日豪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模索と地域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保城広至，《アジア地域主義外交の行方：1952～1966》（東京：木鐸社，2008年）。

最后都接受了通产省的提案，最终促成了 1989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 APEC 阁员会议¹⁷。APEC 的成立可以说是日本在战后推动区域经济主义的最大成果。

此外，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日本也注意到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早在战后就意识到中国大陆在重建日本经济时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是亲美的吉田茂政权或反共的岸政权，也都以政经分离的方式推动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¹⁸。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时，日本更认识到，使中国不在国际间遭到孤立，并将其引导入国际体系，才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大平正芳首相所提出的「環太平洋聯合構想」、海部俊樹首相提出了「世界之中的日中關係（世界のなかの日中關係）」並率先解除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對中國實施的經濟制裁，都是基於這個思維¹⁹。

（二） 后冷战时期

进入后冷战时期，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开始加速发展，一般认为此时的亚洲区域主义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除了经济领域以外，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也开始发展。过去亚洲地区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就曾尝试推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努力，不过都没有成功。例如美国与澳洲就曾推动在亚洲成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集体安全机制，不过由于美国与日本对于重新武装日本（再军备）的问题无法取得共识，加上亚洲各国也对围堵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不同认知，因此这个构想最后无法实现²⁰。南韩的朴正熙总统在 1960 年代推动了「亚洲太平洋协议会（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 ASPAC）」的成立，希望使其成为反共的军事同盟。不过因为南韩与中华民国以外的成员国反对，仅以论坛形式运作，最后因为受到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美中和解等国际大环境的

¹⁷ 菊池努，《APEC: 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東京：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 年），頁 175-212。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渡邊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東京：千倉書房，2010 年），頁 359-364。Takashi Terada, “Directional leadership in institutionbuilding: Japan’s approaches to ASEA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CC and APE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2, May/June 2001, pp. 208-213.

¹⁸ 相关的讨论可参阅：井上，前揭论文。陳肇彬，《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1950 年代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文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王偉彬，《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1950 年代を中心にみた国交正常化へのプロセス》（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年）。

¹⁹ 渡辺昭夫，《アジア・太平洋の国際関係と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頁 98-125。中居良文，〈日中関係：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協調と相克〉，高木誠一郎編《脱冷戦期の中国外交とアジア・太平洋》（東京：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00 年），107-116 頁。高原明生，〈東アジアの多国間主義：日本と中国の地域主義政策〉，《国際政治》，第 133 号，2003 年 8 月，第 67-69 頁。

²⁰ 中西寛，〈戦後アジア・太平洋の安全保障枠組みの模索と日本：一九四九～五一〉，《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 16 号，1994 年，第 69-104 頁。

影响，于 1972 年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后无疾而终²¹。所以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仅限于以美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安全同盟关系。不过进入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出现了东协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以中国为中心的上海合作机构（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为了解决北韩的核问题而召开的六方会谈也被期待可以发展为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²²。

第二个特征则是存在着多个成员、功能重迭的多边合作组织。例如 APEC、ARF、东协十加三（ASEAN Plus Three, ASEAN+3）、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 ASEM）、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这些组织基本上以东协、日中韩三国为主体，印度或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亚洲以外的国家则依组织的属性参与。从功能来看，虽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可以说只有 ARF，不过如 APEC 也被期待可以发展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机制²³。ASEAN+3、EAS 虽然并不讨论军事安全问题，但却广泛的讨论经济安全、人类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²⁴。

不过这些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都仅具对话或论坛的功能，因此日本在后冷战时期虽然也重视多边安全合作，但仍然坚持维持美日安保体制²⁵。例如澳洲与加拿大曾在 1991 年提案设立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的机制。但是海部政权的外务大臣中山太郎在当年的东协扩大外长会议（ASEAN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PMC）提案，认为亚洲地区的历史与地缘政治情势都与欧洲不同，与其设立新组织，不如积极利用既有的 APEC 与 ASEAN-PMC 等机制，同时也强调美日安保体制的必要性²⁶。

三、 安保再定义与日本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

（一） 从同盟漂流到安保再定义

²¹ 大庭，前掲書，第 195-204 頁

²² 天児慧，《等身大の中国》（東京：勁草書房，2003 年），第 117-147 頁。田中明彦《アジアの中の日本》（東京：NTT 出版，2007 年），第 293-300 頁。

²³ David P. Rapk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ower to block: the APEC and AMF cas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August 2001, pp. 373-410.

²⁴ 美根慶樹、青山瑠妙、植木（川勝）千可子、湯澤武、浦田秀次郎、寺田貴、伊豆山真里、白石昌也、フレデリック・ボンイエルト，〈再考、東アジア共同体〉，《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第 7 号，2010 年 2 月，第 4-23 頁。

²⁵ 菊池，前掲書，頁 264-278。佐藤考一，《ASEAN レジーム：ASEAN における会議外交の発展と課題》（東京：勁草書房，2003 年），第 135-171 頁。

²⁶ 外務省，《平成 3 年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1991 年），第 379-386 頁；第 424-429 頁。该提案通称为“中山提案”。

但是在后冷战时期，长期以美日同盟为对外政策基石的日本也因为来自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面临了重大考验。

1955 年以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在 1993 年的眾議院選舉未能取得過半數席次，由新生黨、日本新黨、先驅新黨（新黨さきがけ）、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社會民主連合、民主改革連合八個小黨組成執政聯盟而取得執政權，由日本新黨的黨魁細川護熙擔任首相。

細川首相上任后首先面对的重大对外政策课题就是美日贸易摩擦。1990 年代初期，美日贸易摩擦已经成为美日关系恶化的主因。特别是柯林顿（William J. Clinton）总统上任后，要求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具体数据以改善美日贸易逆差。贸易部长坎特（Michael Kantor）甚至主张，如果日本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提案，美国就应该重新检讨美日的安全合作关系。柯林顿总统在 1994 年 2 月的美日领袖高峰会时当面要求细川首相接受美国的提案，细川首相则拒绝了这个要求。这被认为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对美国说「不」²⁷。

同时后冷战时期初期，不仅亚洲的多边安全合作蓬勃发展，日本也开始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因此日本国内出现了应将对外政策调整为以参与国际多边安全合作为主的声音，细川首相也主张应该重新调整因应冷战的安全政策架构、预算、人事²⁸。

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下，细川首相于 1994 年初成立了「防卫问题恳谈会」，邀请学界与经济界人士、退休的资深官僚检讨安全政策的方向。懇談會於 1995 年 8 月提出了通稱為『樋口報告』的報告書，建議以「多邊安全保障合作（多角的安全保障協力）」、「充實美日安全保障合作關係的機能（日米安全保障協力關係の機能充實）」、「高效率、具信賴性的防衛力の維持與運用（信賴性の高い効率的な防衛力の維持と運用）」作為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懇談會仍然肯定美日同盟是三大支柱之中最重要的核心，但考虑到必须避免国内的美日同盟派与多边安全合作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报告书虽然仍强调日本的安全政策核心为美日同盟，但章节安排则将当时受到重视的多边安全合作列在美日同盟之前。

可是这样的章节安排引起了美国的知日派学者重视。例如格林（Michael J. Green）与克罗尼（Patrick M. Cronin）早已认为当时的美日同盟关系不合现状，需要重新定义并强化美日关系。两人在看过樋口报告的草案与最终报告后更认为，虽然报告书强调以美日关系为核心，但不仅没有明确说明美日同盟与多边合作之间的关连性，草案也比最终报告书更偏向区域主义、多边主义。奈伊（Joseph S. Nye Jr.）也担忧坎特以贸易问题将安全问题会挂钩的作法会影响整体的美日关系。而日本国内的部分官僚在 1994 年的朝鲜半岛危机发生时也警觉，因应冷战的美日同盟架构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如朝鲜半岛危机等在后冷战时期会影响日本安全的国

²⁷ 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 第 3 版》（東京：有斐閣，2010 年），第 207-211 頁。

²⁸ 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 50 年の模索》（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 年），第 325-326 頁。

际危机。

因此奈伊在 1994 年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后，便取得国防部长培里（William J. Perry）的支持，开始与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秋山昌广等日本的防卫政策官僚进行重新确认美日关系的作业。而 1996 年 1 月就任的桥本龙太郎首相不仅对安全保障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也非常积极处理美日在安保问题上最困难的冲绳基地问题，并与美国达成了迁移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市中心的普天间基地的共识。

在這些基礎下，最后由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首相在 1996 年 4 月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邁向 21 世紀的同盟關係（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 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重新確認包括：美日進入后冷戰時期仍然有必要繼續維持在安全政策的合作、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維持亞太地區穩定不可缺少的關鍵、美日在區域與全球議題的合作關係等議題，這也就是通稱美日同盟或美日安保的再定義²⁹。

（二） 安保再定义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安保再定义虽然是属于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但其影响层面却十分广泛。其中日本基於美日安保共同宣言而修正了美日安保防衛指針（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通稱為新ガイドライン或被譯為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最為重要。

首先，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使得樋口报告建议的三大支柱等同于以美日同盟进行了统合。例如美日合作发展飞弹防卫系统不仅可以使日本获得相关技术，日本也得以透过发展飞弹防卫性统而和美国、美国的其他同盟国整合防卫机制³⁰。

其次，新美日安保防衛指針以「周边事态」的方式规定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使得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日本，美日同盟也因此从单纯的双边防衛同盟转型成为对亚洲、甚至全球领域的重要同盟关系。中国方面就认为美日同盟将转型成为类似 NATO 的对外攻击型同盟³¹。美日在 2005 年 2 月达成的「共同战略目标（共通戰略目標）」之中，除了被认为是「周边事态」的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以外，也列入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后复兴、印度洋海啸等问题³²。

此外，安保再定义也影响了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关法令的走向，例如小泉政权

²⁹ 本节有关安保再定义的部分皆参考自：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秋山昌廣，《日米の戰略對話が始まった：安保再定義の舞台裏》（東京：亜紀書房，2002 年）。五百旗頭，前掲書，第 248-254 頁。

³⁰ 神保謙，〈弾道ミサイル防衛(BMD)と日米同盟：日米共同研究の政策過程と同盟の「戰略調整」〉《國際安全保障》，第 29 卷第 4 号，2002 年 3 月，頁 40-58。

³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http://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107.htm〉。金熙德，《21 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159-204 页。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35-466 页。

³² 外務省，《共同発表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外務省》，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2+2_05_02.html〉。

即是以因应「周边事态」而制定的『周边事态法』的架构来规划『反恐特措法』、『伊拉克特措法』、有事法制等安全政策法令³³。

因此单纯从安全领域来看，安保再定义使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扩大至亚洲地区甚至全球领域，也影响了日本国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法令的方向。

不过日本在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持续推动亚洲的多边经济合作，特别是不包含美国参与的 ASEAN+3 即是源起于桥本首相的提案。过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曾于 1990 年提出建立不包含美国在内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 EAEG）」的构想，并在 1991 年以 EAEG 构想为基础，提案建立「东亚经济会议（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但该构想过度的反美而引起美国的反弹，因此也未能获得日本等国的支持³⁴。而桥本首相在 1997 年访问东南亚各国时提出了被称为「桥本主义（桥本ドクトリン）」的对东南亚政策时，建议日本与 ASEAN 各国领袖定期举行高峰会³⁵。ASEAN 各国虽然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而有所疑虑，不过在马哈迪的协调下，1997 年 12 月召开的 ASEAN 领袖高峰会邀请了日中韩领袖参加。而亚洲金融风暴的扩大，更促成了这个机制，也就是 ASEAN+3 的定期举行，日本也提案促成同时召开日中韩三国领袖高峰会。美国虽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同时美日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也在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等经济政策上出现对立，但美国并不希望因其反对不包含美国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而导致日本从这个过程被排除，特别是中国强化与 ASEAN 的关系后更提高了这个可能性；同时亚洲金融风暴也使美国认知亚洲各国合作的必要性，因此默认了 ASEAN+3 的成立与制度化³⁶。此外，日本在过程中不断强调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性，也使得美国不易采取反对的态度³⁷。

（三）小泉政权期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

小泉首相的对外政策虽然是美日关系为核心，但其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上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也就是推动亚洲地区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例如小泉首相任内推动的 EPA，原本是日本在因应亚洲金融风暴时，除了 ASEAN+3 以外所推动的另外一项政策。小泉首相任内与新加坡所缔结的 EPA 就是 2000 年 1 月进入双边

³³ 〈テロ特措法が成立 自衛隊、戦時派遣へ転換 政府、基本計画に着手〉，《朝日新聞》，2001 年 10 月 30 日。〈イラク新法、政府案固まる 活動は非戦闘地域のみ 戦争継続でも「可能」〉，《読売新聞》，2003 年 6 月 1 日。〈有事 7 法成立 危機対応に法体系構築 運用、体制に課題〉，《読売新聞》，2004 年 6 月 15 日。

³⁴ 佐藤，前掲書，第 84-90 頁。

³⁵ 外務省，《平成 10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1998 年），第 186-192 頁。

³⁶ 田中明彦，〈「東アジア」という新地域形成の試み：ASEAN+3 の展開〉，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年），第 296-297 頁。

³⁷ 佐藤，前掲書，第 190 頁。

谈判的过程³⁸。小泉首相为了解决日本国民遭北韩绑架的绑架问题（拉致问题）而与北韩接触，并且在 2002 年、2004 年两次闪电访问平壤。虽然日朝关系并没有因为小泉首相的访问而好转，但是至少取得了包括签署日朝平壤宣言、金正日对绑架问题谢罪、将 5 名绑架受害者及其家族迎回日本等成果³⁹。从这些发展可以看出，小泉首相似乎并没有忽视亚洲。

不过小泉首相对中国的态度上与过去的政权不同，其将中国视为日本在领导亚洲经济统合的竞争对手。例如 EPA 虽然是日本推动亚洲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的代表案例，但许多研究都指出，小泉首相积极推动 EPA 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与中国与 ASEAN 在 2001 年达成的 FTA 进行对抗，并和中国竞争与 ASEAN 的关系及亚洲区域经济统合的主导权⁴⁰。更不用说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中、日韩关系恶化，也连带影响到日本在推动 EAS 的过程中无法顺利与中韩进行整合。纵使第一届 EAS 最后顺利举行，但由于日中韩关系的不佳，所以无法进行深入讨论⁴¹。

四、 民主党政权的东亚共同体主张与政策

（一） 鸠山、菅首相的主张与政策

1. 鸠山政权

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与主张可以从民主党在 2009 年众议院选举的政权公约、所发表的文章、各种演说、鸠山政权在 6 月 1 日发表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等文书之中窥知一二。

民主党在 2009 年众议院选举的政权公约之中，对于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共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以中国、韩国为中心，全力与亚洲各国建立信赖关系。第二，在通商、金融、能源、环境、灾害救援、传染病对策等领域建构亚太地区的合作体制。第三，积极推动与亚太各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签订包括投资、劳动与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的经济合作协议。但是在此同时，也注意不损及食品的安全与稳定供应、提高自给自足率、国内的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等方面⁴²。

鸠山首相也在政论杂志《VOICE》发表的文章也指出：「为了这个地区的安定，

³⁸ 宗像直子，〈日本の FTA 戦略〉，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編，《現代東アジアと日本 1：日本の東アジア構想》（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第 139-166 頁。

³⁹ 伊豆見元，〈小泉訪朝の意義〉，《東亜》，第 424 号，2002 年 10 月，頁 61-65。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 272-283 頁。

⁴⁰ 高原，前掲論文，第 68-69 頁。波多野、佐藤，前掲書，第 242-246 頁。

⁴¹ 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 300-311 頁。

⁴² 民主党，《Manifesto マニフェスト 2009》（東京：民主党，2009 年），第 22-23 頁。

希望能使美国的军事能力能够有效的发挥功能，但是也希望尽量阻止其强大的权力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失控。而在减少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希望使其巨大的经济活动能够有秩序的发展。位于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几乎都会自然而然的提出这样的想法。而这也就是加速区域统合的重要原因⁴³。

这些理念都陆续反映在鸠山首相于 2009 年、2010 年所进行的施政报告、演讲等谈话或文件之中⁴⁴。同时，鸠山首相的外交智囊寺岛实郎在解释东亚共同体时，将美日同盟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比喻为日本安保政策的两个轮胎⁴⁵。因此鸠山首相似乎是希望以经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区域合作为基础，进而在未来推动军事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

2. 菅政权、野田政权

2010 年 6 月接任首相的菅直人在 7 月份的参议院选举时的政权公约、9 月份的党代表选举（党魁选举）时将东亚共同体列于美日关系之后，在 9 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的演说内容也没有提到东亚共同体⁴⁶，但是却突然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提出将推动参与 TPP 谈判的构想⁴⁷。由于 TPP 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因此菅首相提出参与 TPP 的主张，可以说是象征菅政权的外交安保政策开始走向修复美日

⁴³ 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祖父・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VOICE》，第 381 号，2009 年 9 月，第 139-140 頁。

⁴⁴ 首相官邸，〈第 64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鳩山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09/ehat_0924c.html〉、〈第 173 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10/26syosin.html>〉、〈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Yukio Hatoyama “Japan’s New Commitment to Asia: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http://www.kantei.go.jp/foreign/hatoyama/statement/200911/15singapore_e.html〉、〈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1001/29siseihousin.html>〉、〈第 16 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鳩山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1005/20speech.html>〉、〈「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に関する今後の取組につい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006/_icsFiles/afieldfile/2010/06/01/koso_east_asia.pdf〉。

⁴⁵ 寺島実郎，〈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米同盟見直しはクルマの両輪だ〉，《週刊東洋経済》，第 6234 号，2009 年 11 月 28 日，第 97 頁。

⁴⁶ 首相官邸，〈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H22.6.11)〉〈<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第 65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菅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9/24speech.html>〉。民主党，《民主党の政権政策 Manifesto2010》（東京：民主党，2010 年），第 11 頁；第 21 頁。〈菅氏の公約【要旨】民主党代表選〉，《朝日新聞》，2010 年 9 月 2 日。

⁴⁷ 首相官邸，〈第 176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10/01syosin.html>〉。

关系的路线。

此外，菅政权继承了鸠山政权的方针，将基础设施的建设视为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而当中的主力项目是核电厂建设，也成功向越南推销了两座核电厂。但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了芮氏规模 9.0 的「平成 23 年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平成 23 年东北地方太平洋冲地震，以下简称为 311 地震）」，地震引发的大规模海啸造成了位于福岛县两座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等事故，由于危机处理过程反应缓慢、未能确实处理危机，菅政权遭到政学界与媒体的严厉批判⁴⁸。可是 311 地震与相关的核电厂事故的处理被认为是导致菅首相在同年 8 月底下台的关键之一，菅首相一方面在 2011 年 6 月到 7 月之间先宣示要以不依赖核能为目标，⁴⁹一方面内阁却在同年 8 月 5 日通过继续推动核电厂外销政策的内阁决议，⁵⁰显示菅政权的理念与实务上有所矛盾。

2011 年 9 月成立的野田政权的对外政策也延续了菅政权，以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为主⁵¹。野田首相在 2011 年 11 月的东亚峰会建议，可以在东亚峰会的架构下设置论坛，讨论包括东海与南海在内的海洋安全问题的主张（东亚海洋论坛），就被认为事先做好了与美国的沟通⁵²。神保谦认为，野田首相的主张，使得国际间得以建立同时针对东海与南海问题进行对话的场域，也就是东协海洋论坛（ASEAN Maritime Forum, AMF）的召开，日本在当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值得肯定。⁵³

（二）分析

鸠山首相达成的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 2010 年 5 月的日中韩三国领袖高峰会达成了包括设置三国间合作机制的秘书处、至 2020 年为止有关日中韩三国合作方向的政策展望等共识⁵⁴。同时鸠山政权期间的日中关系也看似良好。例如当时在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主导下，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不仅进行了交流，小泽干事长也在 2009 年 12 月率领国会议员团访问中国。同时小泽干事长也要求宫内厅打破一个月以前提出申请的惯例，使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得以与天皇会面⁵⁵。

⁴⁸ 黄伟修，〈日本政府在东日本大地震的危机处理〉，《全球政治评论》，第 38 期，2012 年 4 月，第 47-48 页。

⁴⁹ 小林良彰，《政権交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 年，再版），第 102-128 頁。

⁵⁰ 〈原発輸出、既存の案件継続、政府答弁書、新規の結論は先送り、見直し言及の首相と溝〉，《日本経済新聞》，2011 年 8 月 6 日。

⁵¹ 小林，前掲書，第 137-139 頁。

⁵² 〈東アジア首脳会議 米が主導「中国包圍網」〉，《読売新聞》，2011 年 11 月 20 日。

⁵³ 神保謙，〈外交・安保——理念追求から現実路線へ〉，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民主党政権失敗の検証——日本政治は何を活かす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 年 5 版），第 157 頁。

⁵⁴ 外務省，〈第 3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の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0/gaiyo_1005.html〉。

⁵⁵ 〈外交、目立つ中国傾斜、米と関係ギクシャク、習副主席は厚遇〉，《日本経済新聞》，2009 年 12 月 15 日。

但过去自民党政权的亚洲区域主义政策是以美日关系为核心考虑，如果鸠山首相有意推动东亚共同体，那么最重要的课题将是：如何定位美日关系在整体对外政策的角色。可是鸠山首相直到2010年1月才开始对东亚共同体进行整体规划⁵⁶。同时鸠山首相在东亚共同体是否包含美国的问题上不断做出前后矛盾的发言，例如在2009年10月上旬表示日本太过依赖美国。但是在10月下旬突然又表示没有排除美国参与东亚共同体的打算⁵⁷。此后的相关政策演说与重要文件之中开始强调美日同盟在东亚共同体扮演的重要角色⁵⁸。

另一方面，美日却因为印度洋补给油料问题与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而出现紧张。民主党长期以来反对海上自卫队前往印度洋对参与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联军船只进行油料补给。鸠山首相在上任后也遵守2009年大选时的承诺，宣布不延长自卫队参与印度洋油料补给的法源依据『新反恐特措法』，海上自卫队在该法的执行期限截止的2010年1月初撤离印度洋。但民主党提出的替代方案还是遭到美国驻日大使鲁斯（John V. Roos）等美国官员的质疑⁵⁹。

在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方面，美日虽然在1996年就已经确定将迁移普天间基地，但直到2006年才达成将基地迁移至同样位于冲绳县的名护市边野古海岸的共识。而民主党始终反对这个共识，认为应该要迁移至冲绳县外或国外（如关岛）。但是鸠山政权内部不仅无法在替代案上达成共识，还出现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党干事长、执政联盟的友党在未经协调下各自提出替代案而造成政权内部的发言混乱。而鸠山首相也出现前后矛盾的发言，特别是当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在访日的会谈上希望鸠山首相实践移设边野古的共识时，鸠山首相先对奥巴马总统表示：「Trust me」，使奥巴马总统相信鸠山首相会执行美日共识，却又于12月宣布暂停执行美日共识以寻求新的移设地点，鸠山政权在整个过程的应对也被鲁斯大使批判为「不诚实」。最后鸠山首相在无法取得美国的让步下，只能在2010年5月选择重回美日共识，并在6月2日宣布辞职⁶⁰。

也就是说，鸠山首相的对外政策仅仅只停留在理念层面，而且在没有规划整体对外政策的情况下与美国对立。同时，由于安倍、福田、麻生首相都曾经提出过亚洲地区经济、非传统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多边合作的建议⁶¹。所以鸠山首相不

⁵⁶ 〈財務相就任 両刃の剣〉，《読売新聞》，2010年1月9日。

⁵⁷ 〈米に依存しすぎていた〉，《読売新聞》，2009年10月11日。〈鳩山首相、米国重視を強調 対ASEAN、東アジア共同体説明〉，《朝日新聞》，2009年10月25日。

⁵⁸ 同注44。

⁵⁹ 〈日米関係「同盟重視」を強調 「米国離れ」に懸念も / ルース米駐日大使〉，《読売新聞》，2009年10月14日。〈インド洋給油8年きょう撤退、細る日本の人的貢献、民生支援具体化急ぐ〉，《日本経済新聞》，2010年1月15日。

⁶⁰ 整个过程的分析请参阅朝日新聞政權取材センター編，《民主党政権100日の真相》（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0年）；読売新聞政治部，《民主党：迷走と裏切りの300日》（東京：新潮社，2010年）。

⁶¹ 首相官邸，〈フィリピン公式訪問における内外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12/09philippinespress.html>〉、〈第169回国

仅没有改变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东亚共同体的相关政策可以说几乎是延续过去自民党政权的路线。

至于菅直人首相提出参与 TPP 的主张后，虽然外务大臣前原诚之、国家战略大臣玄叶光一郎都曾经说明这项政策的重要性⁶²。但菅政权的前后两任农林水产大臣山田正彦与鹿野道彦认为，参与 TPP 就必须取消外国农产品的关税，如此将导致日本农业的崩溃，必须慎重考虑；山田正彦与农林水产副大臣筱原孝也表示菅首相有关 TPP 的发言太过突兀⁶³；甚至连负责经济政策的经济产业大臣大畠章宏都表示需要慎重考虑参与 TPP 的问题⁶⁴。由于政权内部的歧见始终无法有效整合，因此无法看出 TPP 的加盟在菅政权的整体国家战略所扮演的定位与角色，最后菅首相任内也没有正式表明日本参与 TPP。而菅首相在 311 大地震之后却宣示减少依赖核电，又决定继续推动外销核电。宣布推动参加 TPP 与核电政策的矛盾，更显示了菅首相即使打算以对美关系为对外政策的核心，但是在相关政策方面其实并没有任何完整、有系统的规划。

AMF 的召开虽然被评为是日本扮演主导的角色，但也从过程也可以发现，即使 AMF 是日本在亚太地区海洋安全问题的对话上扮演角色，也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因此野田首相采取恢复与美国关系的对外政策方针，才是相关政策的成功因素。

此外，在日中关系方面，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位首相早已经以「战略互惠关系（戦略的互惠关系）」的思维推动改善日中关系，也被评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⁶⁵。具体而言，福田首相任内与中国达成了共同开发东海油田的共识，日中韩三国也于 2008 年 12 月举行第一次在 ASEAN+3 以外的领袖高峰会⁶⁶。反观民主党执政后，在日中共同开发东海油田的细节、钓鱼台群岛主权等问题上并没

会における福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8/01/18housin.html>〉、〈第 15 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麻生内閣総理大臣講演「経済危機を超え、再び飛躍するアジアへ」〉，〈<http://www.kantei.go.jp/jp/asospeech/2009/05/21speech.html>〉。

⁶² 前原誠司，〈経済外交を軸に、開かれた国を目指す〉，《外交》，第 4 号，2010 年 12 月，第 6-13 頁。玄葉光一郎，〈TPP を奇貨に FTA 交渉を加速化する〉，《VOICE》，第 397 号，2011 年 1 月，第 96-101 頁。

⁶³ 国家戦略室，〈第 3 回 新成長戦略実現会議 議事要旨〉，2010 年 10 月 21 日，第 17-18 頁，〈http://www.cas.go.jp/jp/seisaku/npu/policy04/pdf/20101027/20101027_gijiyoshi.pdf〉。山田正彦，〈TPP は農業問題ではなく、国の形が変わる問題なのです〉，《経済界》，第 934 号，2011 年 1 月 11 日，第 30-31 頁。〈TPP 「あまりに唐突」 篠原農水副大臣〉，《朝日新聞》，2010 年 10 月 8 日。〈農業再生 TPP で溝 実現会議 全中と経済界火花〉，《読売新聞》，2010 年 12 月 1 日。

⁶⁴ 〈TPP 参加、農業改革カギ—政府・与党内、反対論なお〉，《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10 月 28 日。

⁶⁵ 例如：田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第 311-328 頁。天兒慧，〈アジア連合への道：理論と人材育成の構想〉（東京：筑摩書房、2010 年），第 178-180 頁。

⁶⁶ 外務省，〈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協力について〉，〈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press.html〉、〈日中韩首脳会議（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0812_gai.html〉。

有实质的进展⁶⁷。特别是 2010 年 9 月钓鱼台群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而导致船长被逮捕的事件时（以下简称为钓鱼台撞船事件），菅首相却表示：「民主党内没有人可以直接跟戴秉国对话，事情才会变成这样」，负责处理的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不仅表示外务省与中国之间的沟通管道没有发挥作用，甚至私下透漏：「民主党没有和中国沟通的管道」⁶⁸。所以由此可知，民主党在政党轮替前被认为较自民党接近中国，政党轮替后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日中之间的领土问题等方面并没有因为民主党执政后而有实质的进展，民主党与中国的沟通管道似乎也极为有限。

只是日中之间虽然因为钓鱼台撞船事件而出现对立，但整体而言，并不如小泉首相时期那样恶化。例如 311 地震时，中国不仅派遣了救难队与提供救援物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于 3 月 18 日前往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访问，除了表达对罹难者的哀悼之意，在与日本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会谈时也表明会持续提供援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5 月访日时，也特地前往东北的灾区慰问，并在与菅首相的会谈时达成了在包括原子能安全、防灾与救灾、灾区重建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共识。明治大学教授伊藤刚与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就认为，虽然中国可能还是会因为历史与领土问题而对日本抱持不信任感，但中国也可能是希望透过对日本 311 震灾的支持，改善日本人的对中感情。日中关系也确实出现了改善的征兆，以 2012 年为例，双方的贸易即比 2010 年增加了 22.5%；日本内阁府的调查也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 2010 年上升了 6.3 个百分点；日中也开始推动针对东海问题的安全对话⁶⁹。

可是东京都知事（相当于我国的台北市长）石原慎太郎在 2012 年 4 月 16 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时，表示东京都要向宣称拥有钓鱼台群岛之中的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的地主购买合约，进行更有效的管理。⁷⁰根据报导，石原都知事在 3 月份就向野田首相提及购岛事宜，野田首相因为忙于面对推动提高消费税税率的问题而无暇因应，直到 5 月份才下令首相辅佐官长岛昭久、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滨博行、外务省分别与东京都、地主、中国方面进行沟通⁷¹。

⁶⁷ 〈ガス田交渉入り、日中首相が合意、中国譲歩でも時期未定：日本の政権不安で様子見〉，《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6 月 1 日。

⁶⁸ 〈中国船長釈放へ いらだつ首相「超法規的措置を」〉，《読売新聞》，2010 年 9 月 25 日。〈フジタ社員釈放、手探り外交に危うさ、官邸・外務省に溝：日中修復、なお懸案多く〉，《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10 月 10 日。

⁶⁹ 伊藤刚、高原明生，〈民主党政権誕生以降の日中関係〉，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 年），第 495-497 頁。

⁷⁰ 自称是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地主，并将这几个岛租借给日本政府的栗原弘行在着书表示，会选择向东京都兜售而非中央政府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东京都拥有其他地方自治体所没有的经济能力与管理所属离岛的实际成效，也因为野田政权当时以解散国会换取在野的自民党、公明党支持消费税增税的法案，他不愿意与不知何时会垮台的政权谈判。栗原弘行，《尖閣諸島売ります》（東京：廣済堂出版，2012 年），第 103-124 頁。

⁷¹ 〈尖閣 都と本格折衝 国有化方針 中台、強く反発〉，《読売新聞》2012 年 7 月 8 日。〈尖閣、

野田政权内部评估，如果石原都知事未来可能在钓鱼岛设置港口设施，将会造成日中之间直接陷入危机，而日本的中央政府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可以制止东京都，只能够透过推动钓鱼台的国有化，才能避免问题继续扩大（以下简称为钓鱼台国有化事件），因而在 2012 年 9 月推动了钓鱼台的国有化⁷²。只是野田首相虽然事前事后都持续与中国进行沟通，除了电话会谈外，也陆续派遣外务副大臣山口壮、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杉山晋辅（相当于我国的外交部亚太司长）、外务事务次官河相周夫前往中国访问⁷³，但钓鱼台国有化事件仍然导致了 2012 年 9 月起中国国内一连串的反日游行，日中的政经关系也一口气陷入低潮⁷⁴。

2012 年 11 月 16 日，野田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在同年 12 月 16 日举行的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于 480 席之中拿下了 325 席，囊括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自民党总裁（党魁）安倍晋三于 12 月 26 日当选第 96 代日本国首相，成为了现行日本国宪法实施以来，第二位下台后再度上台的首相，民主党政权仅维持了 3 年 3 个月。

五、 结论

本文检讨了日本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政策之中有关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后发现，无论是经济或安全层面，自民党执政期间始终是以美日关系为考虑来推动亚洲区域主义。在经济方面，日本的主要政策包括了推动与 ASEAN 各国的双边经济关系以及与 ASEAN 为中心的各种多边经济合作，同时也将中国引导入区域合作体系视为重要的目标。亚洲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直到后冷战时期才开始发展，甚至经济合作的多边机制也被认为具有安全对话的功能，但是日本在安全领域始

国有化の方針 中国にらみ次善の策 首相、政権浮揚思惑も》，《毎日新聞》2012 年 7 月 8 日。
〈政府、購入合意 指導部交代前、決着急ぐ 中国は「必要な措置取る」〉，《毎日新聞》2012 年 9 月 6 日。〈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² 山口二郎、中北浩爾編，《民主党政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キーパーソンたちの証言》（東京：岩波書店，2014 年），第 232-239 頁。〈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³ 外務省，〈中華人民共和国——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index.html>〉。〈意思疎通の継続で一致〉，《読売新聞》2012 年 9 月 13 日。〈後退する妥協はあり得ない（12 年 9 月、野田首相） 尖閣国有化、中国が猛反発〉，《日本経済新聞》，2015 年 6 月 21 日。

⁷⁴ 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主张冷静观察的势力，也有同意野田政权是为了避免情况恶化才会推动钓鱼台国有化的声音，但高原明生认为，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中国最后选择了强硬的手段因应。高原明生、前田宏子《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⑤ 開発主義の時代へ 1972-2014》（東京：岩波書店，2014 年），第 189-190 頁。国分良成也指出，当时对日政策成为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反日游行背後有周永康等人的影子。国分良成，《中国政治からみた日中関係》（東京：岩波書店，2017 年 4 月），第 222-224 頁。

终坚持以美日安保体制。而 1996 年的安保再定义不仅强化了美日的同盟关系，也使得美日在区域与全球的合作关系更加明确，日本国内有关安全保障的相关法令也受到安保再定义的影响。同时日本也持续推动亚洲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ASEAN+3 就是源起于日本的提案。2001 年上任的小泉首相虽然被批评为重美轻亚，但其对亚洲区域主义的立场是延续过去的方向，只是小泉首相对日中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政权不同，乃是将中国视为日本在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在 2009 大选前虽然主张推动所谓东亚共同体，但是相关规划牵涉到如何重新定位美日同盟在日本对外政策角色的问题，而鸠山首相不仅没有进行相关规划，其推动或提出的政策也多是延续自民党政权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因为普天间问题基地迁移等问题而与美国失去互信。菅首相虽然提出了参与 TPP 的构想，但对于 TPP 在其整体国家战略的角色等问题显然没有完整考虑，之后的野田首相面对着国内的问题，在外交上以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为主。这样的发展，显示民主党执政前后提出的亚洲区域主义的相关政策其实并缺乏可行性与系统性，所以最后只能走向重新恢复与美国关系的旧方针。

此外，民主党执政后的日中关系也看似有所好转。但自民党执政期间早已开始推动改善日中关系，日中之间如领土问题等也没有因为民主党执政而有所进展。钓鱼台撞船事件反而凸显了民主党与中国之间的沟通管道极为有限；钓鱼台国有化更导致了日中关系陷入低潮，钓鱼台问题目前也成为了日中之间发生对立的火药库。

所以本文的结论可以整理为三点。第一点，2009 年以前的自民党政权推动亚洲区域主义的相关政策时，是以美日关系为主轴，并将中国引入区域合作以稳定日中关系，只有小泉政权例外地将中国视为日本推动区域合作的竞争对手。

第二点，无论是鸠山首相主张的东亚共同体，或是日本对外政策基础的美日关系、同为重要关键的日中关系，民主党执政期间所推动的政策不但没有达成具体的成果，从过程中反而可以看出民主党对相关政策并没有系统性的规画与思考，导致了鸠山政权期间美日之间失去互信，甚至连日中关系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生了影响至今的对立。

第三点，菅、野田政权最后重返了过去自民党以对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代表日本任何政党执政，都难以改变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架构。

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重回执政至今已经快要 5 年，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仅次于小泉政权的长期政权，安倍首相在上任之初，强调要更加鞏固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的美日同盟，恢复美日之间的羈絆，並主張「外交的基本方針，不只是關注到與周邊各國的雙邊關係，要有如眺望地球儀似的俯瞰整個世界，立足於自由、民主、基本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以推動戰略外交」⁷⁵，安倍首相的主張普遍被

⁷⁵ 首相官邸，〈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稱為「地球儀外交（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主張看出，安倍首相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石推動外交安保政策。可是透過本文的分析就可以了解，日本推動亞洲區域主義的主要關鍵之一的日中關係，已經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因為釣魚台問題而出現了延續至今的对立，南海的主權爭議問題從 2012 年起越來越深刻，北韓與恐怖主義對全球的威脅更是日益深刻，甚至美日關係也因為 2016 年上任的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推動了宣布脫離 TPP 等政策而出現了不明朗的局勢，可以說安倍首相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自民黨執政期間完全不同，而且是一個更為艱難的國際環境戰略。安倍首相如何在這樣的國際戰略環境下推動「地球儀外交」與亞洲區域主義等外交安保政策的相关問題，也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附记

本文中文版初稿曾发表於《第一届全国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中心暨第一届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年会》，日文版〈日本の对外政策におけるアジア地域協力〉曾刊登於《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第9号（2011年2月），经过早稻田大学地域・地域间研究机构许可後，将日文版论文重新改写为中文并增补相关内容。感谢主持人许介麟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评论人严震生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场提问的阿南友亮教授（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当时为日本东京成德大学教授）与增田雅之教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给予的批评与指教，也感谢天儿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藤考一教授（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松田康博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平川幸子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当时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助理教授）、张望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当时为日本早稻田学亚洲研究机构研究助手）在本文初稿撰写的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协助。本文也是笔者担任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学术振兴会基盘研究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A「対中依存構造化と中台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ポスト馬英九期台湾の国際政治経済学」（研究代表：松田康博，課題番号：16H02005）协同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黄伟修 Wei-Hsiu Huang

学 历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2010）

现 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 台湾的大陆政策决策过程、两岸关系、日中关系、日台关系、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

官方网页 <http://www.ioc.u-tokyo.ac.jp/faculty/prof/whhuang.html>
<https://weihsiuhuang.jimdo.com/>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2017年8月1日创刊

出版日：2017年8月1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 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 伟修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August 1, 2017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August 1, 2017 Vol. 1 No.1

<http://jeast.ioc.u-tokyo.ac.jp/>

**Asian regionalism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LDP and DPJ administration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